

罗曼·罗兰

让-雅克·卢梭简介

让-雅克·卢梭是心灵的力量压倒其时代的最突出的范例之一。他渗透、改变和彻底改革他那世纪和以后世纪的社会。旧的破碎的世界对他的怨恨并没有放错地方。它放在他的门口，如像放在伏尔泰的门口一样，要他对十九世纪的一切动乱负责：“这是伏尔泰的罪过！这是卢梭的罪过！”这是《悲惨世界》中维克多·雨果的流浪儿童的两句嘲弄的歌词。

但是在伏尔泰和卢梭之间，后者起了远为重要得多的作用。伏尔泰是百科全书派这一庞大而密集的星群中最灿烂的明星。卢梭却是孤身一人，单枪匹马进行战斗。我们将看到在他的战斗中他甚至触怒了百科全书派，因为他拒绝了他们的道德，而在社会的观点上他也高过他们。伏尔泰和他的战友狄德罗、达朗贝尔、霍尔巴哈、赫尔维修极力赋予新精神的否定方面以人性，专心致志于旧社会及其偏见和弊端的抨击；他们是自

由理性的吹毛求疵的和爱嘲弄的战士。只有卢梭一个人描述了建设的方面，肯定了新的信仰；他是共和国的宣布人。法国革命宣称他是它的肇始人；把他神化的事发生在国民议会的高峰时期。正是罗伯斯庇尔签署了一纸命令才把他的骨灰送进先贤祠。

卢梭本人自然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过他的著作在他死后会获得这么大的胜利。有一切理由使人相信，他也像伏尔泰一样本来是不承认那场向他欢呼的革命的。但是伟大的著作往往胜过它们的作者。正是他们所传播的思想掀起了预见不到的风暴。这样引起的社会骚动仍然还是他们的著作。虽然他对命运分配给他的任务提出异议，卢梭这个孤独者在历史上总是这场风暴的前驱，新时代的创始者。

关于卢梭的最特别的实情是不仅他预见不到他的名声和天才的后果，并且这两者来到他身上也非他所愿望的。

让-雅克·卢梭的生平和著作在文学史上提供一个天才人物的范例，也许是独一无二的，天才降临其身不仅是自发的，而且违背他的意志。

他出身于日内瓦的小资产阶级家庭，生性羞怯，没有意志力，性格平庸，幼年就被送去历练各种冒险生活 耽于梦想 喜爱游荡 但是懒懒散散 轻浮 健忘 随

风驶舵，没有进取心，看不到明天，满足于平庸和 教的生活的平静，除了喜欢听听浪漫的和色情的音乐之外，别无所求。一直到他三十七岁，没有什么东西来干扰他。但是没有什么先兆，他的天才突然涌现，像圣保罗一样，他被惊雷击倒了，关于这个我以后会说到；他一下子变得耳聪目明，笔杆子这种火烈的武器被他握在手中。他发现自己已投身于竞技场，在那里人类精神的最卓越的战士正在众目睽睽的观众面前互决雌雄。只是从最初的一击，他就压倒群雄。既惊奇而又有点害怕，他听到自己的几乎辨认不出来的声音带着重音充满竞技场，这些重音同古代讲坛上发出的一样强大，它们抨击最受崇敬的偶像和动摇社会的基础。

他可能非常感到害怕，他发誓不再写作了。他被他自己释放出来的洪流转了进去。他是个共和主义者，站起来像棵橡树，高压在那时的君主制度之上。这个易怒的人却经常保持一种坚强的、一种不可信的神志清醒。他当时还是个流浪汉和空想家，一个伤感的和脆弱的无政府主义者，他想使自己成为最开明的和坚定的立法人。

在他身上所有这些力量把他压倒了，他渴望着把它们丢掉。好像他身上有一种可怕的而又是暂时的才能，从天空飞来一纸命令，委派他一项任务，并把他举

得高过他自己，使他神气十足地过了十二年，天才的十二年，以后他又重新退回到单调的和醉生梦死的生活。这种生活正是他一直渴望着的。但是由于他所作的努力过猛和由于他的火热的言词的猛烈反应而引起失去平衡，他陷入一种悲剧的精神错乱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悲伤全靠他的音乐之美来缓和。

他是 1712 年六月二十八日出生在不平常的“日内瓦城和日内瓦共和国”，这是经过改革的福音派的中心地，它的存在本身就很悖谬，因为有一大群君主专制的和天主教的国家包围着它并且不断地向它入侵。

让-雅克对他的出身很感骄傲，毕生难忘。他的笔名是：“让-雅克·卢梭，日内瓦公民”，他声称他有作为“一个自由国家的公民和有主权的人民的一份子”的权利。他把他的关于不平等起源的论文献给“日内瓦共和国”。他小心翼翼地关注着“他的祖国”的保卫，尽管它对他并不领情，而且还要迫害他。他从不迟疑地去赞美这座劳动人民的都市和它的良风美俗。他每当离开它时总是流露出依依不舍之情。“让-雅克，爱你的家乡吧！”当他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他父亲曾这么对他说。“你是一个日内瓦人；他有朝一日将看到其他的民族；你将不再看到和你自己的民族相象的民族了。”他永不要忘记这个劝告。“每次他研究政府问题时，

他总是想在他的调查中找到热爱他的家乡的新的理由。在他的对所有政府的批评中“他只把一个单独分开并提出来作为典范。”这就是日内瓦。

他立誓要成为坚定的新教徒，虽然环境却使他在年轻时便改信天主教。但在1754年他又重新大摇大摆地走进改革派的新教教堂，在他风华正茂的时日，他有胆量直言不讳地宣称：“我是巴黎新教派的一个忏悔者。”不管他在日内瓦和纳沙特尔的牧师中间由于他从广义上解释基督教精神，他的宽容和仁爱而引起过风暴，他还是证明他总是“紧紧地追随福音的学说……我爱它，我采纳它，宣扬它和解释它，我全心全意地依附于它。我所有的著作都感染着对福音的同样的爱和对耶稣·基督的同样的尊敬。没有什么东西能同福音相比。这部书应被看作是基督的教规，而我的书只是一个学生的注释。”当他在巴黎最得意的时候，在宫廷贵族和仇视上帝的百科全书派哲学家中间，他读《圣经》常常读到深夜；他在长夜不眠的隐居生活中读它从头到尾连续读完五、六遍。他多少有些夸张地称自己是“法国唯一信仰上帝的人”。

共和国和上帝，这个双重的爱，这个双重的信仰。他是靠日内瓦的乳汁喂养起来的；正是这个已经深入他的血液。正是这个使他在巴黎有别于那时所有的法

国作家。

不过，我们应当补充说明，即使在他骄傲地保持着日内瓦人的特立独行的精神时，他也常常表现出对法国的偏爱。他曾想把这种情绪压下去，但是徒劳无益；他承认他常常感到对法国偏爱太过分了，以致“看到它的一点小小的成功就会高兴得心跳，而它的倒退则使他感到好像灾难临头时的苦恼。”

加上他的家庭原是法国血统。他是被逐出法国的清教徒难民的后裔。他的母亲苏萨娜·贝纳尔才貌双全，一生下他来就弃世了。就父系来说，他的祖父是制造钟表的工匠，强壮而聪明。他的父亲伊萨克·卢梭是和蔼可亲的，但又是漫不经心的、粗暴的和闲不着的，一个流浪汉和冒险家，一个嗜读成癖的人。他把这种癖好灌输给他的儿子并且也把他的东游西荡的习性传给了他。父亲和儿子，他才六、七岁，两人都沉溺于读小说，往往读起来通宵不眠，“有时父亲在早晨听到醒来的燕子的鸣声，会很难为情地说：‘我们去睡吧；我比你还孩子气呢。’”，

但是让-雅克的最好的先生，他的导师是普鲁塔克，他一直伴随他从摇篮到坟墓。“当我六岁的时候，普鲁塔克的著作落到我手里；我就把他的大名牢记在心。我曾读过每一部小说。在心被迷醉上小说的年纪

之前，它们就已使我泪如雨下。从这些著作中培养起我爱英雄的浪漫的事迹的兴趣，这些事迹越来越多，它最终使我讨厌除了那些与我的幻想相合的之外的每件东西。”

失掉了母亲的孩子，十岁时又被他的父亲遗弃，生活不能自理，他从梦境里找到生活的避难所。早熟的厌世想思（浪漫主义的先兆）引起他到自然里去找栖身的幽居。他“发现自己同他自己周围的那些幻想的人物打交道，要比同他在世界上所看到的人打交道容易得多。”这个“完全靠他的想象支撑起来的社会”几乎使他迷失生活道路，并引起他的意志力的消失。在他的童年和他的青年时期的开始正是如此，他同善良的人们相处得很好。那些年代的回忆，在《忏悔录》的前几卷里，有一种迷人的魅力。谁不熟悉这些，谁就不能认识真正的让-雅克。人们常常把他看作是他的伟大著作所创造出的道貌岸然的人物，似乎他是一个好争辩的、善于词令的和摆起面孔说教的人。然而这样看他是不公正的。其实他的性格是爽朗的，多情的，魅惑的，轻快的，快活的，健忘的，一见热情就扑上去，无力抗拒他的嗜好，非常脆弱而有自知之明，头脑基本上是清醒的，没有怨恨和杂念。一想到他在没有指导者的监督的情况之下，他在流浪的少年期能保持住难以置信的肉

体的清白，这是多么惊人的事。他的道路通过最不洁的，甚至是恶劣的和败坏的地方，但是这只小天鹅连一支羽毛也没弄脏。

他曾迷惑过许多人，但由于不能想象的刚愎自用，轻率浮躁、考虑不周、没有决断，记忆力差，完全健忘，他也曾使他们失望，因为这样，他今天相交的朋友和得到的东西，明天就可能失掉。他做什么也没有坚持到底，往往是半途而废。他在哪里受教育？直到二十岁他什么也不知道。那些考察过他的人，甚至是最好心的人都达到一致的结论，他没有前途，他最好去当一名小小的乡村本堂神甫。所有这些一点都没有使他烦恼。

同一位妇女的邂逅决定他的一生。1728年在安纳西他见到华伦夫人，一见就迷恋上她了。五十年后，在他笔下写出的回忆录的最后几页，他用同样的感激之情向他的好“妈妈”大喊大叫：因为失掉母亲的孩子常常总在寻找母爱；正是在华伦夫人身上他找到了。

想暂时离开她一忽儿之后，为的是顺从这个年轻妈妈的愿望，她希望他去闯出一个前途，但并不能获得成功，这个流浪儿徒步奔走于安纳西和都灵之间的旅途上，越过阿尔卑斯，然后去里昂，去洛桑和纳沙特尔，从那里常常是徒步常常做梦常常瞎混来到巴黎然

后重新又回到他的妈妈身边来，她这时已移居尚贝里。她终于既泄气又陶醉地把年轻的情人引进家门。她也像他一样是敏感的和肉欲的，漫不经心的和梦幻般的，和蔼的，容易走极端的，但是同那些最爱她的人们是很不一样的，那些人一离开她就都被忘掉了；她从不知道她打算让让－雅克干什么 即使她知道 她也不在意。但是那个三年——他们一块在尚贝里附近的夏梅特的愉快的房子里度过的三个醉人的夏天（1738—1740）

在让－雅克看来简直是做了一个天堂的梦。在同一时期他尝到了“纯粹的和圆满的幸福”的甜头，他继续自修文学教育，——像他早年时期那样的流浪汉和保持他一贯的性格 读书是没有计划的 蒙田、拉勃吕耶、巴勒、波须哀和伏尔泰的著作他都读。这后一人是他未来的敌人 他的哲学通信 卢梭本人承认“最能吸引他去研究，”而且最早激起他的写作兴趣。他说“我在阅读中形成的这种趣味引起我学习优美地写作和试图仿效那些如此使我感兴趣的作家的美丽的色泽的欲望。”

不过，归根到底，人们会说他的教育是不完全的，和伟大的大百科全书派成员比起来还差得远：他除了普鲁塔克、塔西佗、塞尼加和一点儿柏拉图，也许还有一点维吉尔之外，就没有更多的经典著作的知识。但他足够成为凭直觉进行推测的天才，他能把他从伟大学

者像蒙田或波须哀使用的引证中和从他的瑞士乡下佬穆拉尔特讲解英国文学中所吸取来的东西加以消化活用。

再说他的最大的教师不是任何书本。他的老师是自然。他从童年时起就热烈地爱上了她，而这种热情不表现在他的累赘的描写上面；自然浸染他的全身，她凭确实的清醒和显著的特征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她使他陷入狂喜状态，愈到晚年愈甚，这使他很奇怪地近似东方的神秘主义者。

在1741年，受了华伦夫人的欺骗，就是当他离开他们的家时，他在她身边的位置被人强夺去了，他主动放弃国籍而去巴黎。他已三十岁，他的唯一的来源是十五个银路易，一个小喜剧的手稿，一种新体系的乐谱，他想靠它取得名誉和幸运。他总是把自己看成是音乐家而不是作家；甚至在他的笔杆的最初成功之后，他还是坚持——有点幽默地——迷恋着音乐的精神，其实他只不过是个刚刚及格的作曲家，没有什么发明，甚至训练也很差。

他开始浪费时间和金钱，在咖啡馆和沙龙里混日子。但是这对他也不是毫无益处，靠这样他得以认识芬塔莱尔、马里瓦、康迪拉克，而特别是狄德罗成了他的好友。他也获得许多妇人的青睐，她们为这个没有

身份证的年轻的日内瓦流浪汉找到了法国驻威尼斯大使馆的秘书的职位（1743年五月），这事看来有些丢丑（其实这在当时并不奇怪）。因为同大使争吵了一场，他在1744年就离职返法。在巴黎，他重新找到狄德罗和得到豪华的包税人（有土地的商人）的支持，他登台演出一些小型的音乐剧和伏尔泰和雷蒙的作品的改编剧。1754年他同一个年轻的旅馆女仆戴莱丝·瓦瑟*同居，她始终是他的伴侣，直到死才把他们分开。她后来给他生了几个孩子；哎哟，这些孩子都被他一个接一个送进了育婴堂。他想出各种不成理由的理由来给这种行为辩解，其实这些理由从没有使他满意，而最后给他留下来的是无休止的悔恨和自责。

直到三十七岁他仍然是在那些穷酸文人里头混，他们靠捡拾大财阀和他们的伙伴的桌子上的面包屑过日子。这里没有什么预示他的命运，1749年夏天他被雷电似的袭击打倒了，这我在前面已谈过。他每次说到这次经历都不禁全身发抖。

他有一天去探望因违犯出版法而被禁闭在范塞纳监狱里的狄德罗。这年的夏天特别的热。沿着没有树荫的路他得步行两里格*的距离。在他走的时候，为

在同居二十五年后他最后才同她结婚。

* * 长度名，在英美约为三英里或三海里。——译者

了减缓速度，他边走边翻阅一期文学杂志。他一下发现第戎学院征奖的公告，要求就如下的问题作出答案：《科学与艺术的进步是有助于伤风败俗或是移风易俗呢？》他立即被“一千条光线刺穿了”；大量的活思想”向他袭来，他呼吸闭塞，兴奋到极点；他倒在大路旁边的一棵树之下，在精神错乱的状态中度过了半小时，当他睡醒起来时外套的前面都被泪水湿透。“从那时起，”他写道，“我住进了另一个世界 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这不仅是学院对他提出的问题的回答，并且这样一来好像闸门打开了 放出了“巨大真理”的洪流 形成他全部未来著作的基本材料。这冲击使他明白他的真正的本质。

他例外地被放在一个位置上去观察这个时期正在酝酿着的社会不安。他不属于法国人和巴黎人的圈圈之内的人，也不信服绝对专制的统治，这是可以靠放松道德和对生活的冷嘲热讽的态度来求得缓和的。最独立的作家，百科全书的编纂者都是些随遇而安的人物，他们从他们所反对的弊端中吸取教训。他的最初三十年是作为一个渺小的瑞士流浪汉在一种快乐而又昏昏然的气氛中度过的，这样的生活使他成为一个爱逃学的儿童，不能忍受社会的束缚和法律的管制。因此他对巴黎的矫揉造作的文学界和宫廷生活的精神上的 和儿

乎肉体上的压抑特别敏感。起初，他感到害怕，感到窒息，他还想把他的痛苦、反抗和厌恶的感情压下去。但是这些感情反而越积越高。现在它们终于爆炸开了。只是一击，他就揭开了社会的弊端——腐败和社会的不公平。对他的第一次呼喊的巨大反响揭出一个他一直没有料想到的任务。

他的成功不仅远远超过他自己的预期，而且超过它的十分平庸的价值，这是他给他的处女作所作的评价。尤有甚者，公众舆论一抓住它就给它以革命的意义，虽然卢梭坚决否认，但没有成功。人们在他身上看到一个文化的破坏者，因为他宣布一切文化成果都毫无价值。他的唯一的要求是救他自己和同他一起救他的小小的祖国日内瓦，办法就是使他们脱离那个过分精耕细作的世界的病源，那里的文明化达到超病态的程度，以致引起“物种的退化”——然而没有希望把患了不治之症的病人治愈。

但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他一旦拿起笔杆，就不能放下，一不做，二不休，必须继续写下去。他的思想的洪流因他的处女作《论文》的空前胜利而增涨，把他投入“一个英雄主义和美德的发酵过程中”它的“种籽是在他的童年期由他的父亲，他的祖国和普鲁塔克播下的。”

我们应当看到伴随 1749 年他的“大放光辉”而来的是膀胱炎的突然发作，这个病此后一直折磨他到死。他的情况看来是无望了。在 1749 年医生估计他至多只能活半年。我们可以想得到，这个宣判将把一个真诚的和勇敢的灵魂投进怎样的狂态里去！卢梭不再有任何东西去压制。

他什么也不压制。他只看到他先前所尊敬的和被他们视为同伙的哲学家的“学说中的错误和愚蠢。”他看到的“只是社会制度中的压迫和苦难。”他说这个的音调毫不减弱。他认为“为了让人们听见，他应当言行一致。”他说到做到。他改换衣装，丢掉白色的长袜和漂亮的衬衫，卖掉他的手表，解下他的佩剑，穿上一套厚布的平平常常的衣服，戴上一个圆假发；他辞掉出纳员的职务，宣称他要当一个工人，一个乐谱抄写员来挣钱糊口。这是在他内心发生的一次革命，一个世纪之后在托尔斯泰身上也重演了一次，他是在卢梭的范例和训诲之下诱发起来的。“我真的脱胎换骨地变了。”谁也认不出他了，他不再是腼腆的、羞怯的、见什么也害怕的、渺小的外国人了。“我的冥想深思使我对时代的风俗、箴言和成见满怀鄙视之情，对那些怀有成见的人们的鄙视淡然置之，我用我的警句压倒他们的俏皮话，就像我用手指捏死昆虫一样轻而易举。多么大的变化

啊！整个巴黎都在传诵我的尖酸刻薄的讽刺话，两年
前和十年后都同样是我这个人，却找不到他必须说什
么，也找不到用什么词儿来说它。……”

假如往后他说他受到迫害，这是发生在论战时期，
这场论战是他向当时的整个社会宣布的和挑起的，人
们必须找出他所引起的这种毫不留情的讥讽的根源。

继讨论科学、艺术和文明的弊害的论文之后，在
1753年他又写了关于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的论文，它的
社会意义和革命剧烈程度远远超过第一篇论文。卢梭
发觉他被自己身上燃烧着的反抗精神和他的思想的不能
和解的逻辑弄得昏昏然，以致竟敢指责财产的观念，
说它使不平等产生出来，因此由国家来调节这种不平
等是有必要的，而当国家遇到必然衰颓的命运时，权力
就被富人恣意夺取了去，他们最终使人种退化为奴隶。
他指责未来的普鲁塔克的民主。^{*}十八世纪的许多哲
学家已经接触到这些大胆的思想；但是他们没有一个
曾运用最轻微的意志力量来使他们的推理变成积极的
形态。卢梭也没有彻底做到。对他来说思想不是儿
戏。他是很严肃的。当他出言诅咒富人的时候，总不

“在一个君主国里一个私人身份的富裕绝不可能把他放在王
子皇孙之上，但在共和国里，却很容易把他放在法律之上。那时政府不
再有权，而富人往往是真正的国家元首。（给达朗贝尔的信。）

免全身发抖，而当他宣布反叛是一种“合法的行动”时，当这反叛把“那逐渐抬头的专制的”暴君绞死或废黜的时候，他更感到害怕。

由于他有演说家的天才，他善于运用影响群众的方法，这更增加了这些思想的危险性。他为自己创造了一种鼓动群众的露天演讲的风格，把当时作家所使用的书呆气十足的每一种其它的风格一扫而光*。

这可以在他（给达朗贝尔）的第三封信讨论戏剧问题（1758年）——第283页——里看出有一股热情洋溢的雄辩的急流非常强烈地刺激着公众的舆论。其中一部分已经是革命的演说。达朗贝尔，这个著名学者，五、六个学术团体的成员，明白表示，他真有点害怕同这位无名小卒交锋，他的头衔只不过是“日内瓦的公民”而已。

“同你的这支笔作战实在太危险了……你懂得如何取悦公众，就凭你表现给他们看的这种轻蔑……”

他把他比作路德！

现在不再是对少数几个人说话的问题了，而是而向（广大的）公众，……风格的改变已成为必要；为了让全世界更好地了解我，我只好短话长说。（给达朗贝尔一封信的前言。）

他的政敌达朗贝尔表示同意：

“虽然这是讨人厌的，但你有权这样做，我还是读下去。”

卢梭最迫切的愿望就是同公众和世俗告别，离开巴黎而退隐到自然界里去，孤身一人。他说到做到。他利用包税人的妻子，生气勃勃的埃皮奈夫人送来的邀请而住进蒙莫朗西森林里的“隐庐”。1756年四月九日他就在这里定居。“只是从这一天起”他说：“我才开始生活。”

他从前的朋友，他的同事对此完全不理解。他们谴责他的离群独居只会招来物议，或者是出于顽固不化的厌世情绪。卢梭在给马勒赛尔卜的信（1762年）中感到有必要辩白一下。他说他的隐退的真正的原^因是“难以抑制的爱自由的精神，什么东西也不能制服它，在它面前荣誉、幸运、甚至名望都不在话下。”他诚恳地补充说：“爱自由的精神出自内心，并且与其说是出自骄傲，还不如说是出自懒惰；这种懒惰是不可思议的；每件东西都使他害怕；公民生活的最轻微的义务都受不了；一句话，当有必要时，写一封信，或者作一次访问，对我都是一种折磨……”当他年华正茂之际，就追求一个目标：“隐退和休息。”从这时起他就以此为乐，抓紧及时利用它们。

他自己身上的魔鬼正是它们毁灭的原因。

他终于一个人呆在“隐庐”里，非常满意地玩味他的长辈，德国的浪漫派所谓的“渴望”、“忧郁的快乐”。